

“4·25”上訪事件 真相揭秘

佚名



99年4月25日萬名法輪功學員在府右街國務院信訪辦上訪



批示被鎮壓法輪功的幹將羅幹給扣壓了)朱鎔基讓選幾個代表進去進一步說明情況,大家紛紛舉手,朱鎔基在舉手的人中隨機指了幾個人進入國務院。有很多人見證了當時的情況。這之後,被拘禁的天津學員於當天就被釋放,信訪辦週圍的請願人士因為政府已經解決了問題,很快也就解散回家。天津暴力事件得以和平解決。

當朱鎔基總理下令天津放人並承諾法輪功代表進一步溝通另兩個要求時,江澤民於4月25日當夜以中共總書記的身份,給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關的領導寫了一封信。在信中,江澤民強調“4·25”事件“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無聯繫”,以及“幕後有無(中共內部的)高手在策劃指揮”。這封信被整理成“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印發《江澤民同志給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關領導同志的信》的通知”,並以“密級絕密中辦發電[1999]14號”文件的方式,於4月底至5月初,在黨內(從高層到基層)秘密傳達。

6月13日,在中共內部緊急傳達另一份“絕密中辦發電[1999]30號”文件,標題為“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印發《江澤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關於抓緊處理和解決“法輪功”問題的講話》的通知”。文件中記載了江澤民6月7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江稱,“顯然,”法輪功創始人“不可能有這麼大的能耐。‘法輪功’問題有很深的政治社會背景乃至複雜的國

法輪功學員去天津市政府上訪請求放人,被市政府官員告知被捕學員的獲釋需要得到北京的授權,從而趕到北京去向國務院信訪辦上訪。並不像輿論宣傳中說的“包圍中南海”,因為法輪功學員去的是國務院信訪辦,而國務院信訪辦的位置恰恰就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的西側(府右街),這一點正好被利用說成是去中南海。

報告記述,“4·25”當天一早朱鎔基總理親自走出國務院來接見上訪學員。

當時朱鎔基問:“你們幹甚麼來了?誰叫你們來的?”有許多學員說:“我們來反映法輪功的問題,沒有人組織。”朱鎔基又問:“為甚麼不寫信上訪?怎麼這麼多人都在這兒?”很多學員都在回答,有學員說:“信都寫的成麻袋了,還沒得到回應。”朱鎔基說:“我對你們的問題有批覆。”學員驚訝地說:“我們沒有收到。”(事後得知總理的

聞,都只不過是一面之詞。大陸群眾在按照當權者的要求揭批法輪功時,他們真的了解法輪功嗎?

當然,對法輪功的批判也是“生動”的,有血淋淋的圖像,有“前法輪功煉習者”的控訴等等。但是,這些都沒有脫離強權的操控,都屬於一面之詞的範疇。過去,父母一旦被批鬥,子女馬上宣佈與其劃清界限甚至進行揭發的也不在少數,“生動”的個案不一定反映事件的真實情況。兼聽則明,一些理智、清醒的人還是要追問:法輪功信眾的看法是甚麼?

兩年來,法輪功信眾所做的只不過是平和的上訪以及要求與政府對話,而當權者借著政府名義所做的主要是強迫人們放棄煉功和不讓法輪功信眾說話。你看信訪部門門口密密麻麻的警察,當權者在不讓人們說話方面的確是不遺餘力。鎮壓法輪功的政治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禁止法輪功信眾說話的運動。

不允許人說話,使鎮壓法輪功的政治運動在正當性、合法性上面臨的最大問題,其中潛伏著對真相的掩蓋、對民眾的蒙蔽和個別人卑劣的動機。

條件。但是,在法輪功問題上當權者並沒有走法制的路子,依然是官方媒體單方面的口誅筆伐,法輪功哪裏有甚麼說話的權利?

法輪功信眾上訪是被禁止的,凡是上訪的都要被拘留;判處勞教也不必聽取當事人的申辯;官方文件限制甚至禁止律師接受遭受刑事指控的法輪功信眾的委托,法輪功信眾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無法得到辯護。即使是一個殺人犯,法律也給予其充份申辯的權利;如果他無法聘請律師,法院必須依法代為指定辯護律師。為甚麼少數當權者對法輪功信眾就如此不擇手段呢?

江澤民和他的追隨者指責法輪功如何不好,可人們從來沒有機會聽聽法輪功信眾說了甚麼,卻見到那麼多人心裏不服不斷上訪。為甚麼不允許法輪功信眾說話呢?實在想不出甚麼可以說得出口的理由。

過去政治運動中的一言堂,可不是政府工作方法上的疏忽,而是少數當權者的一種故意的不擇手段行爲,不然就無法整垮那些鬥爭對像了。今天針對法輪功的運動是否有這樣的嫌疑?

不允許法輪功信眾說話,大陸公眾接收的有關法輪功的資訊無論如何聳人聽

這裏不討論大陸很多政府部門中的不法分子對法輪功信眾五花八門的迫害,也不論及官方媒體諸多不實之詞,以及為了防止法輪功信眾上訪強迫行人在長途汽車站、火車站罵人等惡劣的做法,單從人之常情的角度談談人說話的權利。

中國大陸以往的政治運動都是清一色的一言堂,鬥爭對像沒有任何說話或者申辯的機會與權利,雖然批鬥的時候從政府到媒體都振振有辭,最後證明還是一起冤假錯案。這樣的教訓還不深刻嗎?

據說現在是民主法制時代,它與“文革”那個時代最大的區別就是遵循最基本的程序處理社會矛盾,而不是搞甚麼單方面的階級鬥爭了,允許人說話是達致公平的最低

禁止法輪功信眾說話的政治運動

據說現在是民主法制時代,它與“文革”那個時代最大的區別就是遵循最基本的程序處理社會矛盾,而不是搞甚麼單方面的階級鬥爭了,允許人說話是達致公平的最低